

试论歌德创作的两面性

赵迪奉

摘要 文章从歌德思想性格的二重性,18世纪德国社会政治背景的特殊性,以及文学史角度等三个方面,探讨歌德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面性问题,以对其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歌德 两面性 思想性格 社会政治 文学史

歌德是近代西方文艺的一大支柱,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欧洲文化,也表现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社会的衰败和寥落,更展示了他本人思想性格的两面性。

别林斯基曾说过,歌德作为艺术家是伟大的,但作为人物是渺小的。这种伟大与渺小共存于一体的现象,伴随了歌德一生。他的精神世界表现为,一方面是反抗、超然、扩张的浮士德;一方面又是妥协、沉沦、收缩的靡菲斯特。一方面他是突破、否定、嘲讽的伟人,一方面又是限制、认同、谄媚的庸人。这种两面性表现为不断斗争、不断和解、不断重复。历尽沧桑的歌德在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这样形象的概括:“我可以这样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的舒服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的滚下来又推上去。”^①

纵观歌德一生的创作,我们觉得这一思想轨迹是那样鲜明而深刻,那样绵延而久远。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歌德的思想演化和创作发展过程,我们觉得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争、批判的“狂飙突进”时期;第二阶段是妥协、克制的魏玛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平复超脱的晚年。从微观角度看,在每一个阶段的创作中,始终可以找到歌德思想河流两面性的主河道。

歌德第一部反封建、反专制的杰作,是“狂飙突进”时期发表的《葛兹·冯·伯利欣根》。他以热血青年的慷慨激昂,举起了叛逆的旗帜,对德国腐朽的丑恶的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现了德国人民渴望自由和国家统一的心情。但是歌德和当时许多思想家一样,无法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他所描写的葛兹的结局是,背弃了起义的农民,孤军奋战,最后落得一个阶下囚的命运。因此,恩格斯称这个剧本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②葛兹不愿联合农民的实质是向王室和诸侯的退让。这一历史性错误,铸成了他必然失败的悲剧。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向我们透露出歌德在叛逆反抗的道路上,并不是义无反顾的一往无前,而是在“狂飙突进”中留有谨慎的瞻顾。这也可以说是,在歌德斗争、突破、奋进的思想原野上,第一次投下了退让、限制、跌落的阴影。

《少年维特的烦恼》向来被看作是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憬和苦闷的杰作。作品通过个人的自由追求与根深蒂固的传统限制的冲突,道出了时代的呼声。歌德以维特毁灭作为诉状,向人们控诉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偏见,自私守旧和旧贵族的傲慢与虚伪。表现了一代青年对自己在政治上无权,社会上受鄙视的处境的深切感受。提出打破等级界限、建立符合自然的社会秩序和人人平等的新关系。以实现“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新理想。所以,恩格斯说:“歌德写成了‘维特’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③但在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德国来说,“狂飙天才”们的这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既不能在浸透小市民庸俗习气的环境中立足,又不愿与肮脏的现实妥协,那么等待着他的唯一的最后一着,就是以自杀来维护自己心

灵的高尚纯洁。维特终于成为钉在德国苦难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维特对那个令人窒息的社会所进行的孤独而消极的反抗,一方面反映了“狂飙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青年歌德思想上开始发生危机。他开始屈服于现实,对德国的丑陋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在斗争与屈从之间,最终他选择了后者。虽然,维特的死曾赢得无数青年男女的眼泪,但他那种怯懦无力的反抗,在强者眼里,只是一种软弱、卑微的表现。它也表明歌德希求自由、幸福,但却没有勇气去争取;讨厌、憎恶庸俗和卑陋,却没有胆量去改变的心态。在他追求光明和崇高理想的旅程中,又一次泄露出了犹豫、动摇的思想闪光。随着他生活中狂飙时期的结束,他的理想逐渐走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说歌德在“狂飙运动”时创作的主调是抗争、扩张、嘲讽;那么魏玛时期创作中的迁就、收缩、谄媚因素就逐渐增多了。歌德在这时期所创作的,无论是《埃格蒙特》,还是《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托夸多·塔索》,都显露了歌德自我克制,委曲求全,与丑恶环境妥协的思想倾向。正象当时歌德的许多朋友所惊诧的一样,“天才诗人”变成了一位谨小慎微的宫廷大臣。

最能代表歌德这一时期思想转变过程的作品当属《托夸多·塔索》。剧本描写了一个敢于揭露宫廷腐败的反抗者,蜕变为一个自我节制、安于现状的庸人的演化历程。虽然,塔索对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封建小朝廷作了无情的挞伐,但他并不能与宫廷割断关系,昂首阔步地走自己的路,最终他还是和自己的敌人握手言欢,妥协让步。诗人塔索和宫廷之间的冲突象征着资产阶级天才和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塔索最后向敌人和封建礼教投降,实质是歌德这一时期思想、生活状况的写照。它真实地反映出歌德由反抗斗争趋向自我克制直至最后妥协的过程。《塔索》是歌德向节制、退让、沉沦方向,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蹒跚步伐。这也表明,狭隘、卑琐的18世纪德国的世俗,迫使最杰出的人物也只得俯首屈从。

魏玛从政,使得歌德在叛逆和反抗的立场上倒退了许多。但我们决不能认为他已经堕落到腐朽的保守派的地步,如果那样来理解歌德就完全错了。法国大革命的震荡,使歌德认识到,一个新的危机四伏的时代已经到来。90年代末的歌德是动摇于希望和怀疑之间的。一方面,他对德国现实中的偏狭、陈腐和停滞不满;另一方面,他又不主张用暴力革命击碎这一切。他想在德国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找到一条自己理想的道路,这就是通过人道主义的教育,塑造完整的人格,以求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威廉·迈斯特》就是这种理想的美学表达。小说中的主人公威廉,是一个对宫廷狭隘,统治者的浅陋和小市民的庸俗深恶痛绝的人。他想冲破这个圈子,走向充满活力的思想世界。在经过一系列的迷茫、纷扰和曲折后,威廉终于找到了人生艺术的真谛:这就是依靠开明贵族,建立一个为人类服务的秘密团体。在封建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凭借部分理想化的贵族来解救社会,这不啻是儿童的天真梦幻,而且在实质上反映了歌德回避现实,不承认现实的态度。这里,我们又一次不得不为歌德对德国现实所做的妥协而惋惜。他已没有魄力把威廉写成象葛兹那样起来反抗的人,也没有勇气将威廉写成象维特那样舍身求“仁”的人。它再一次表明歌德宁肯取乌托邦式的改良主义道路,也不愿倒海翻江地搅乱现存制度。这实际上也是歌德在研究空想社会主义之后,对解决深刻的社会矛盾所勾划的艺术设想。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如果他不能冲出束缚自身的社会圈子,任他做多大的努力,最终还得做圈子中的人。歌德的人生,为此做了证明。

最能体现歌德精神世界的两面性作品,就是他的经60年创作而完成的无与伦比的杰作《浮士德》。这部伟大诗剧,不但展示了歌德晚年思想中的矛盾,也囊括了歌德一生精神世界发展的全过程。冯至教授曾说:“《浮士德》总的说来,是光明与黑暗,肯定与否定,向上与沉沦的斗争,但是在代表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浮士德和魔鬼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这说明这两种精神绝不是那样黑白分明,判若云泥。浮士德追求光明,努力向上,却也接受魔鬼的引诱,有时濒于沉沦的边缘。实际上,在魔鬼的身上也有歌德自己的成分”。^①这一精辟论述,从两个层次上说明歌德精神世界的两面性。首先,他说明歌德通过这一杰作,想向世界证明,人类就是在光明与黑暗,肯定与否定,向上与沉沦的抗争中成长起来。浮士德追求真理,上下求索,克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最后走向胜利,正是人类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在挫折与成功,失败和胜利中前进的。而人生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歌德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概括:人类只有战胜黑暗、挫折和沉沦,才能到达光明、胜利和向上的彼岸。因此,歌德坚信:“《浮士德》

囊括着人类的全部历史——从特洛伊毁灭到攻克米索朗吉亚”。^⑤其次它从另一层次上说明,浮士德不满足阴暗的书斋生活,追求崇高理想,历尽艰难,寻找人生妙谛的过程,曲折地表达了歌德本人的生活道路和精神探索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歌德就是浮士德。作为天才的歌德和作为恶魔的浮士德的激烈斗争,一生都在歌德内心沸腾。因此,郭沫若说:“他这个人确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他是浮士德、神、超人;而同时又是靡非斯特匪勒斯、恶魔、狗。”^⑥歌德从高擎反抗大旗的“葛兹”,到成为节制妥协的“塔索”,最后成为精神探索的浮士德,这是歌德为自己描摹出的绝妙自画像。而他的一生就是在限制和要冲破限制的矛盾中度过的。

为什么歌德的创作会反复呈现出这种以抗争、奋斗和扩张而始,以退让、沉沦和抑制而终的变奏呢?这一特殊现象反映了哪些本质问题呢?我们认为,只有找到了这个答案,才能更好地解读他的作品。

首先,我们觉得歌德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造就了他的二重性格。他的二重人格导致了创作上的两面性。那么,对歌德思想和性格形成影响最大的事件是那些呢?我们认为以下三件事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第一件事就是和赫尔德的交往与参加“狂飙运动”。1770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认识了“狂飙突进”运动精神领袖约翰·赫尔德。他被对方博大精深思想,渊博宏富的学识所倾倒。赫尔德那种对现存制度决不妥协和彻底批判的精神唤起了青年歌德的反叛精神。他们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狂飙运动”,很快在他们周围聚起了大批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们公开地表达了对德国丑陋现实的叛逆精神。这可以说是形成歌德反抗、突破意识的第一个契机。

这种反抗和突破的思想,反映在此期创作中就是创造出了叛逆英雄葛兹和普罗米修斯。这种叛逆意识一直延伸到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身上。威廉的出走游学、浮士德不倦追求,都可在这里找到初始的渊源。

“狂飙突进”运动的结果是根本无损于愚昧落后的德国。歌德也认识到只通过文学活动反对现存制度是徒劳的。他决定亲自参加社会政治事务,通过“君主教育”造成“好皇帝”,进而达到改革社会弊端,引导社会前进,造福人民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影响歌德思想性格的第二件大事——到魏玛从政。他希望在这块弹丸之地实施自己的社会改革纲领。他一头扎进完全陌生的政治事务之中,苦心孤诣地想在各方面建立新秩序。为此,他和宫廷经常发生难以掩盖的矛盾,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不得不抛弃个人自由,屈从于使他无所作为的狭窄环境之中。越到后来,他变得越是谨小慎微,寡言少语,不轻易相信人。直到晚年,歌德在总结自己时还说:“四海驰名,高官厚禄,这些本来是好遭遇。但是我尽管有了名誉和地位,我还是怕得罪人,对旁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⑦十年从政,歌德对卑陋、狭隘的魏玛并没有改变什么,反倒是肤浅、猥琐的魏玛把他改造成一个庸人。以致于最后被一些人片面地呼之为“公侯的奴仆”。因此瑞士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凯勒兴奋地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这样对歌德气愤。是否一个写过《浮士德》、《塔索》、《伊菲格妮》等名著的人会是一个自私的小商贩,一个这样囤积谋利的人竟能写出《浮士德》、《塔索》等等。我不明白,这使我更为痛若,歌德是一个这样伟大的天才,而这伟大的天才竟有这样的个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个性。我不知道,我是要恨歌德而厌弃他的著作呢?还是为了他的著作而爱他,而原谅他的错误?”^⑧至此歌德的二重人格就基本形成。——一方面他追求崇高理想,蔑视庸俗的社会;一方面他又兢兢业业,尽心倾力为封建王朝服务。他终其一生,都未能在宫廷大臣和天才诗人之间做出合理的选择。这个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的人生尽头。也因为这样,他才写出了委曲求全的塔索,妥协退却的威廉·迈斯特和二重人格的浮士德。十年从政,一无建树,苦闷至极的歌德正象他过去碰到困难时一样,偷偷地溜到了意大利。出走意大利可以说是歌德性格最绝妙的写照。罗曼·罗兰说:“歌德永远不格斗……他只有一件武器,一件,永远是一样的:在障碍之前,他逃避,他头也不回地逃避。他抹掉了一切接触——肉眼的或心灵的。正如他思想的生命是不断征服,他在人群中的生命是永久的退隐。”^⑨罗曼·罗兰对歌德性格的这种精辟分析,真是达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

影响歌德世界观形成的第三件事情就是他毕生对自然界观察和研究所形成的蜕变论思想。他把研究植物学所得出的蜕变理论推而广之应用到对动物和矿物等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最后甚至用它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他的这种认识论反映到创作上,便是描写了两个在蜕变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人物,这就是上下求索、不断前进的浮士德和艰难探索最后找到人生意义的威廉·迈斯特。他还用蛇蜕皮和凤鸟自焚

等比喻,来阐述自己关于进化和演变的思想,这种新与旧的交替,死和变的结果是使事物不断地向高一阶段发展。因此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便是主人公永不满足,永远追求,尽管有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但他们从不放弃自己奋发向上的初衷。这种张弛相伴、沉浮相随的思想也便一再地表现在他的创作中。

正是由于上述诸种原因,才造就了歌德性格的二重性和世界观中的矛盾。魏玛现实的狭窄生活和他追求远大理想之间的矛盾,是他终生烦恼的而又无法逾越的障碍,尽管他象浮士德那样永不停息地追求崇高目标,但最终还是越来越不幸地转回了原地。因此恩格斯不无遗憾地写道:“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⑩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反对德国的庸俗卑鄙;但他也象塔索、伊菲格尼亚、迈斯特一样迁就、迎合丑恶的现实。所以,他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有崇高、博大、抗争的一面;也有渺小、卑琐、妥协的一面。

其次,把歌德创作中的两面性简单地归咎于歌德思想性格的二重性,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那么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现象产生呢?我们认为形成这一特殊现象还与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歌德所生活的时代,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诸侯封建割据的地区,根本无所谓统一的国家。这种封建庄园经济,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德国的政治经济都很落后。恩格斯曾经写道:“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一切都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⑪在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基础上,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当缓慢,而且数量可怜的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依附王公贵族生活。这就决定了德国的资产阶级,既不可能发动象法国那样的大革命,也不可能推动象英国那样的产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象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创造的富有战斗精神和革命气势的文学艺术,更不可能产生象法国那样最终引发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就当时德国所进行的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狂飙运动”,与整个风云激荡的欧洲大背景相比,显得那样声轻气淡。德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发动社会革命的气派和胆略,仅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开展了一些活动、在精神世界里创造理想形象,因而给予社会政治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虽然,他们也曾喊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民族统一,要求个性解放的口号,但显得那样苍白无力。更因为他们脱离人民群众,仅是在小圈子里鼓噪一阵,所以历史注定他们还必须在苦难中继续等待。因此,这时的德国文学艺术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一面资产阶级为自己在政治上无权,社会上无地位的状况感到委曲,因而发出了色厉内荏的反抗,辩争的呼喊;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力单势弱,无法自立的境况感到惶惑而妥协、退让。歌德的创作恰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这种搔首踟躇、举步游疑的窘迫状态。这一现象在德国文学艺术界,不只是歌德一个人,就连被海涅誉之为刚正不阿的席勒,在晚年也回避现实政治斗争,逃向康德哲学的理想国里。即令是声名赫赫的黑格尔也都未能摆脱德国市侩的习气。由此看出,歌德创作中表现出的两面性,既是时代的特征,也是德国资产阶级软弱和妥协性的反映,无怪乎歌德在晚年和爱克曼谈话时还说:“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⑫在举世皆浑我自清的时代,歌德的悲剧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如果我们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来看待歌德创作中的两面性问题,就觉得这一现象更易理解。他不象那些文学史星空中的流星式人物一样,稍纵即逝,他是跨越两个世纪、直到今天依然辉映文学星空的恒星式人物。他既不象愤世嫉俗、慷慨激昂的拜伦、波德莱尔之辈,高举着讨伐的旗帜,一路杀到底;也不象阿谀逢迎、神色忧郁的拉马丁、茹科夫斯基之流,低吟着烦人的颂歌,昏昏然而去。他以巨人的眼光观察和注视着欧洲和世界。他的创作应和着时代的节奏,紧扣现实的脉搏,有张有弛。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他的创作

更深入到历史的深层,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从他绵延 6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就象是一部时代的文学史。它既有对历史文化遗产继承的一面;也有对其扬弃和发展的一面。歌德在创作中表现出的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现象,正反映了歌德对生活 and 历史的认真思索和艰难认同。一部《威廉·迈斯特》,前后写了 50 余年;一部《浮士德》写了 60 年,便是对上述问题的绝好证明。但我们还应该看到,歌德并不想完全成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更多地沉缅于个人感情之中,艺术之中和自然界里。他并不是那种孜孜不息地为人类的最高利益去奋斗的人,而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宫廷游乐,观察自然中的人。因此,他对人类和历史的关注、仅仅是诗人式的关心。所以,他的作品不会激起人们的行动,只不过引起人们的钟情和热恋罢了。“他并不能逃避时代的矛盾性,而这矛盾性在很多方面必然就是他自己的矛盾性。”^⑬

约而言之,歌德创作中这种两面性,也是当时德国文学的宏观特征反映。因为德国文学也走了一个由“狂飙突进”——高涨,到古典主义——低落;而后浪漫主义——高涨,现实主义——低落的曲折道路。作为一朵民族文学河流中的浪花——歌德是无法超越时代的,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德国诗人和作家。唯其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注 释:

①⑦⑬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2 页、20—21 页、40 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第 634 页。

③⑩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第 259 页。

④⑧ 冯至:《论歌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87 页,195—196 页。

⑤ 艾米尔·路德维希:《歌德传》,甘木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8 页。米索朗吉亚,希腊的一座城市。1825 年至 1826 年的希腊独立战争中,希腊人曾在此英勇抗击土耳其人。

⑥ 转引自华东六省一市高校编:《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45 页。

⑨ 罗曼·罗兰:《歌德与贝多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 页。

⑪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633 页。

⑬ 汉斯-尤尔根·格尔茨:《歌德传》,伊德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42 页。

ON THE TWO-SIDED NATURE OF GOETHE'S WRITING

Zhao Di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some explorations of the constant two-sided nature in Goethe's writing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duality of Goethe's thought and character, the peculiarity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in 18th-century Germany, and the literary history. It attempts to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his writing.

Key Words Goethe two-sided nature thought and character society and politics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 王 抒)